

1875—1876 年北路军粮采运及相关事情

李满喜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光绪元年(1875), 清朝决议收复新疆, 左宗棠作为清朝奉命的钦差大臣, 通过打通北路粮道等办法来解决西进军队的粮食难题。该论文主要探讨 1875—1876 年间北路军粮采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包括西进军队的布署, 北路采运局的设置、北路军粮采运路线等具体情况。

关键词: 西进军; 粮台、北路采运局; 军粮采运路线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同治元年(1862)陕甘回民起事, 其影响蔓延至整个西北地区。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新疆。同治十年(1871)俄国以“代收代守”为目的占领新疆伊犁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白彦虎带领回民起事残部进入新疆, 并联合阿古柏反对清政府。在此内忧外患之际清政府采纳左宗棠之“塞防与海防并重”之主张, 并使其担当收复新疆之重任。用兵新疆, 首先要求军粮和军械等后勤保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一、西进军队的布署

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 清廷发布上谕, 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 仍帮办军务”^[1], 并关外粮食转运等事宜均归使左宗棠督办。作为钦差大臣的左宗棠很清楚, 自古“粮、运两事, 为西北用兵要着”^[2], 此时受他指挥的军队“合共百三十余营”^[3], “约六七万人。”^[4]左宗棠直接统帅的马、步兵二十九营, 分驻肃州、玉门、安西、敦煌和哈密间的大后方, 并督办西进兵事和军粮等诸问题。左宗棠把军事要务交给湘军统帅刘锦棠, 刘锦棠统帅共六七万兵分三批、三路行进。第一路是收复新疆北路, 哈密是进入新疆的第一重大门户, 巴里坤则是新疆北路重要门户; 第二路是收复吐鲁番, 吐鲁番是进入新疆南路的重要门户。第三路是收复新疆南路。此时清朝政府的兵力仅散在从哈密经巴里坤、古城子(今新疆奇台县)到济木萨和塔尔巴哈台一线上。左宗棠的军事布署主要为由徐占彪率军守巴里坤到古城子一线, 张曜率军守哈密一线, 金顺兵勇进驻济木萨的最前线。

二、设置北路粮台与采运局

(一) 北路粮台的设置

“师行粮随, 关系极为紧要”^[5], 军粮供给是历来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对西进军队来说, 何地建粮台, 如何采运军粮等, 成为必先解决的难题。但在粮台及采运局的设置问题上西进军队指挥者当中有不同的主张。

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 管理西征粮务之户部左侍郎袁保恒上奏称: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处, 设立粮台, 均不相宜。惟巴里坤为南北适中之地, 且紧接大军之后, 拟将粮台移设巴城。”^[6]

袁保恒最初提出粮台设在巴里坤的想法。但“惟袁保恒所奏移台巴城, 虽以调运乌、科之粮为

言，以调运南路为末著，而注意仍在肃州。” [7]

当时西进军队的粮食来源主要是以甘新道的河西走廊一带的粮食运至新疆古城子等地，而袁保恒仍有意将运粮主线放在河西走廊的甘肃肃州。

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奏称：“关外军粮匮乏，其原因，一是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处，皆系兵燹之余，户口凋敝，田地荒芜。二是乌里雅苏台等处，并不产粮，断难分济大军。” [8] “北路乌、科等城无粮可采，仍应在肃州设立总台，安西、哈密、巴里坤设立分台。” [9]

显然，和袁保恒一样，景廉的注意力也在南路，其运粮重心仍放在甘肃肃州。

左宗棠在其光绪元年（1875）二月奏折中说道：“粮台之设，原以支应粮饷军需，俾前敌各军得一意驰驱，无须分心储峙。其必紧居大军之后者，势所当然。巴里坤距各军驻扎之古城、济木萨等处，为程七百余里，车驼畅行无阻，台设巴里坤，照料易周，各军赴台领运，取携甚便。回乱以来，城垣完好如常，旧为北路商贾辐辏之所，百货萃集，市廛鳞次，今昔无殊。袁保恒称粮台宜移设巴城是矣。” [10]

左宗棠认为巴里坤受回乱影响少，并且一直以来是南北两路商业贸易重镇，在巴里坤设置粮台方便于南北两路军粮的转运，但粮台设置最基本的要求，其附近必须产粮以供采购。可是，巴里坤并不具备该条件。

左宗棠又称：“惟巴城产粮无多，从前天时地利人和，三厂屯田，日久荒废。从新经理屯政，暂无近功。经理如不得人，更滋虚耗。金顺上年在此采办军粮，民商分购，仅得七千余石。其明征也。” [10]

西进军最高统率者左宗棠，似乎在 1874 年已经决意将粮台设立在巴里坤。尽管巴里坤并不盛产粮食，他设法弥补这一不足，并试图尽快将粮台设置一事付诸实施。

经过一番讨论，西进军队的北路粮台最终设置于巴里坤。

（二）北路采运局的设置

经历 1862—1874 年十余年的交战，本来粮食产量甚少的河西走廊等南路的粮食采购已严重供不应求，无法再为西进军队提供军粮，左宗棠对此十分清楚。他也明白从其他地区采购军粮是西进军队最迫切的问题。此时，左宗棠从“广加谘访”中得知“归化、包头至射台、大巴一带十数站，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中间产粮之处甚多。其地虽无台站，无一定地名，然旧时商旅之赴巴、古、乌鲁木齐者，每取道于此。以其有粮可购，有驼可雇，价均平减也。” [7]

由于军粮采运需要，左宗棠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和河套产粮地区与西进军事联系起来。当初他和他的将领，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产粮与否，很有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而经“广加谘访”之后得知。归化城、包头、土默特等地康熙年间始清廷用兵西北的军粮供给之地，并顺、康、雍期间内地汉族农民的流入及道光年间赴蒙经商的商号雇用农民在人工开渠后，已使归化城、河套地区农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区。18 世纪中叶，由于对农业移民的管理需要，在这里设置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五厅，并设归绥一道专管。出现在左宗棠奏折中的归化城、包头、余泰 [11] 等地，均在其范围内。在左宗棠从陕甘进入新疆之前，西进军队的统帅也曾从归化、包头一带采购粮食，可以从左宗棠奏折：“景廉前与金顺书称包头运粮实亦不少，非虚言也” [7] 证明这一点，只是并没有专门设置采运机构。

同治元年（1862）陕甘回民起事之后，从内地至嘉峪关的驿路也被堵截。在南路军粮采运路线瘫痪之际，“关外军粮无论由何处采办，左宗棠责无旁贷，务当悉心经理，俾资饱腾，毋得意存膜视。” [12] 必须及时设置采运局并保证西进军队顺利前行是左宗棠的责任所在。

为了把河套地区的军粮采运至新疆古城子，西进军队专门设置北路采运局，并“总局设于归化，分局设于包头。”^[1]

三、北路军粮采运路线

清朝对于新疆交通最为关注，凡内地至新疆分别设置台站，以保军事运输的畅通无阻。当时京师到新疆由北路几条台站大道而行，新疆通往蒙古之三条大路：“一自奇台东趋瀚海、漠南地方，如宁夏、绥远等可以直达，是为南路。一自奇台东北可趋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以达库伦，是为中路。一自承化东趋乌梁海与科布多，是为北路。三路在蒙古总汇于乌里雅苏台，在新疆总汇于迪化。”^[13]这是左宗棠所说的“北、南、中三大路。”^[14]北路又称为是迪化北路。这条“由归化城至新疆古城，土人谓蒙古草地。”^[15]又“曰后山路，分大小西路。小西路经武川、百灵庙等处，大西路经武川、瓦窑等处，俱至哈拉牛敦。两路合为一，再西北而抵古城。沿途水草充足。大西路路程短而站口大，中断红果岭等处有流沙。小西路路程长而站口小，水草亦较丰。”^[16]由于“它是从归绥向北越过大青山到漠北以及天山南北地区。也叫做后山路。”^[17]再《土默特志》里有条归化城至巴里坤的正西路（西营路）：“自归化城启程，经武川、达尔罕、茂明安，由乌拉特中公旗入外蒙古，途径七十二站，抵达新疆古城子。此路分大西路、小西路两条路线。大西路从归化城出发经可可依力更、百灵庙、公忽洞滩，至哈喇牛敦与小西路会合，至古城子，全程 2595 公里。小西路从归化城出发，经可可依力更、百灵庙、乌兰不浪，至哈喇牛敦并入大西路，至古城子，全程 3180 公里。小西路路程长于大西路，但沿途站口小，水草均好于大西路，所以商旅喜走此路。西营路为驼路。”^[18]《归绥县志》中也写到：“北路，归绥至古城，六千余里。此路俗称蒙古草地，亦曰后山路，分大、小西路。小西路经武川、百灵庙等处。大西路经武川、瓦窑等处。俱至哈喇牛敦（在外蒙三音诺颜部南境）两路合为一，再西北而抵古城，沿途水草充足。”^[19]

上述所指大、小西路是由原来的杀虎口经过归化城到推河流域的阿尔泰军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商路。但左宗棠向清朝奏明时从归化城有一条商旅往来捷径直到巴里坤，即“除北、南、中三大路外，南有一捷路，由归化城包头而西，不经乌科不由四路，别有间道，可达巴里坤，自包头向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余站，其间为乌、科及归化各城所属蒙地，无台站而有屯庄，蒙汉杂处自为聚落，产量之地，颇多雇驼亦易，由大巴西北十六站抵巴里坤，则无台站无屯庄，计程以驼行一日为一站，自归化城起驼行三十余日可抵达巴里坤，遂呼为三十余站，所经之地属何城管辖无从确悉，但称乌、科实则近时商旅赴西路者均以此路为捷径，未尝绕道乌、科两城也。”^[14]并路程“远者五千余里”^[20]。

很显然小西路的走向与历程是不符合西进军对的运输路线，小西路主要由北路台站大道而行，并左宗棠奏折里所说的“远者五千余里”相差较大，大西路的路程虽接近五千余里，但大西路所走的路线是“以归化城为起点绕过黑勒库河，抵达可可伊尔根、乌兰不拉克、昆都伦克楚，至爱毕哈，至齐几尔汉，至特木儿，至布尔哈苏台，至五郎厄鲁儿，至古尔板哈沙图，至察汉，至夏沫儿，至五尼图，至波罗苏海，至察汉厄儿儿，至马尼图，至敖石喜，至家哈至尼尔哈孙搜儿，至察不雀儿，至尼楚滚，至库尔奇勒，至图格里克达，至哈拉尼多，至乌纳根乌苏，至昏鄂空厄勒，至塔奇，至西拉布里多，至阿尔博尔吉，至博济河朔，至推河。”^[21]再从推台到都图库特尔，最后抵达巴里坤。大西路也是从阿尔泰军台的基础上发展站起来的民间商路，大、小西路的区别在于内扎萨克蒙古的路线不一致，到外扎萨克蒙古哈喇尼多两路会合，最后抵达新疆古城子。大、小西路是属于左宗棠所说的“北、南、中”三条路线的蒙古至新疆路线，除了这三条大路线以外“南有一条捷径”，不经过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城，也不走南北两路台站大道，“自包头向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余站，其间为乌、科及归化各城所属蒙地，无台站而有屯庄，蒙汉杂处自为聚落，产量之地颇多，雇驼亦易。”

这里所说的蛇太是包头西北三百余里的余泰，很显然，大、小西路的始端不符合这条捷径。并左宗棠所说的余泰与大巴之间十余站，大巴与巴里坤之间十六站，“归化城至哈喇尼丁路程约 2680

里” [22]，从谢彬游记可以看出，大巴在于余泰与巴里坤之中间，大、小西路汇合之处哈拉尼多处不远。并且余泰、大巴之间的十余站是属于乌、科二城及归化城之蒙地，蒙汉杂处产量颇多之处，并无台站，这与“归化包头转运路线从不行走台站。” [23]相符合。因清朝末年，回民起事之影响，外扎萨克蒙地与新疆之间的台站稍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从内地至嘉峪关的路被堵截以后，宁夏将军克蒙额奏：“甘肃军兴以来，驿路梗阻，前任宁夏将军庆昫，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间，在阿拉善旗地，奏设蒙古台站，接运军火饷鞘。” [24]这是由于回民起事之影响长城以北包括阿拉善旗等蒙古地方设置了新的台站，1866 年（同治五年）嘉峪关路被切断之后，新设的台站一直延伸到额济纳旗。并 1875 年（光绪元年）时由阿拉善旗经过额济纳旗到巴里坤的台站也发展成粮道。这些新的台站与丰镇、宁远、和林格尔、归化城、萨尔沁、包头等后套运粮大道相连接。归化城、包头、余泰等地，均在其范围内。

这表明当时西进军队采运河套地区军粮时经过阿拉善、额济纳两旗。谢彬游记里所记载“归化城自奇台自此计程五千一百余里” [22]又“计程以驼行一日为一站，自归化城起驼行三十余日可抵达巴里坤，遂呼为三十余站，”因为当时的“蒙古台站地广人稀，每台间隔百余里。” [25]驼行一日为一站，一站约百余里，三十余台站的路程约合五千余里。这与左宗棠所说的“远者五千余里”相差不远，并与西进军队的运输路线大体一致，并“察罕桃李该，此处有路通乌里雅苏台，驼行计程二十二站。” [26]这意味着他所走的这一条路未经过乌里雅苏台，这与左宗棠所说的粮运路线并不“经过乌、科两地” [14]较符合。再《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和《新疆游记》里记载有关这条捷径较符合西进军的粮运采运路线。

新疆 游记》	归 化 城	比 齐 克 齐	桃 苏 好	囫 圪	包 头 镇	空 洞 林 沟	乌 兰 胡 洞	大 赫 太	倍 尔 汗 兔	哈 喇 桃 力 该	乌 尼 乌 苏	爱 力 素 胡 洞	哈 喇 尼 丁	什 拉 胡 力 苏	老 爷 庙	三 塘 湖	巴 里 坤
《中 国 历 史 地 图 8》	归 化 城	北 斜 齐	托 西 贺	惠 鲁 弟	包 头 村	昆 弟 伦 河	吴 阑 呼 土	余 泰	布 尔 汗 兔	哈 拉 托 洛 盖	鄂 尼 苏	额 勒 逊 库 图 勒	哈 拉 尼 多	西 拉 布 里 多	老 爷 庙	三 塘	巴 里 坤

[27]

根据上述西进军队的粮食采运捷径主要是以归化城为起点，经过归化城至包头间的台站大道，北斜齐、托西贺、惠鲁弟等地，由包头绕过昆弟伦（即昆都伦一作者）河向西北经吴阑呼土、余泰、布尔汗兔、哈拉托洛盖（由此出内扎萨克蒙旗）经过赛音诺颜部左翼右旗的边界鄂尼苏、额勒逊库图勒，入外扎萨克蒙旗三音诺颜部南境，继续向西至哈拉尼多，又经过塔楚河左岸的塔奇，再到推河流域的西拉布里多，向正西方向进入扎萨克图汗部境内右翼后末旗的阿尔泰山脉之阿济山，经老爷庙、三塘抵达巴里坤。

这条捷径的起点归化城至哈拉托洛盖地方是土默特后套地区，也是归化城至包头的台站大道上的重要地区，“大余泰是萨拉齐厅西境较大的村镇之一，此地方为南北之要冲。” [28]

哈拉托洛盖至鄂尼苏、额勒逊库图勒,这两地连接新设的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台站，并在于阿拉善、额济纳旗与乌里雅苏台的边界上。从这里进入外扎萨克蒙古之后与蒙古草地路之台站大道相

连接。“至哈拉尼多，至乌纳根乌苏，至昏鄂空厄勒，至塔奇，至西拉布里多，至阿尔博尔吉，至博济河朔，至推河。” [29]

哈拉尼多，即“外扎萨克蒙古三音诺颜部南部右翼中旗境内的哈拉你多” [30]，康熙时代始北路驿站之西路（即自归化城至推河）和阿尔泰军台会合之处。从这里经过塔奇达推河流域之西拉布里多，“推河流域是个四面环山，可屯可牧之地。” [31] “西拉布里多在推河流域的左岸”。 [32]最后从阿尔泰山脉之阿济山入新疆东北“经老爷庙、三塘到达巴里坤。” [33]三塘湖在巴里坤以北二百四十里，“这也是一条巴里坤通往蒙地的一个门户。” [34]

综上所述，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二年（1876）西进军队采运军粮的路线主要经过内扎萨克蒙古河套地区之归化、包头、余泰等地，再经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与乌里雅苏台的边界，再经外扎萨克蒙古赛音诺颜部哈喇尼多与扎萨克图汗部之阿济山，从乌、科两城南部抵达新疆东北之巴里坤。这条路线既有粮可购，又有驼可雇，价格也低廉。所以一般商旅也喜走此捷径。

北路采运局从光绪元年（1875）年5月试办至光绪二年（1876）7月一年有余时间，从河套地区采运的粮食达“五百余万斤” [35]。这些军粮对西进军队的粮食供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晚清时期，蒙旗与清朝的战争关系上不仅仅是蒙古骑兵的参战，而是蒙旗更多地提供战争物资。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 [M]. 第一一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9 .
- [2] 左宗棠全集·奏稿 [M]. 卷 43,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68.
- [3] 左宗棠全集·奏稿 [M]. 卷 47,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23.
- [4] 秦翰才. 左文襄公在西北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5. 122.
- [5] 左宗棠全集·奏稿 [M]. 卷 46,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26.
-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 [M]. 第一一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 .
- [7] 光绪朝东华录 [M]. 光绪元年二月壬午, 总 36-40 页.
- [8] 光绪朝东华录 [M]. 光绪元年春正月癸亥, 总 29 页.
- [9] 光绪朝东华录 [M]. 光绪元年二月甲午, 总 43 页.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 [M]. 第一一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3.
- [11]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M]. 第八册,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初版, 1996. 57-58.
- [12] 光绪朝东华录 [M]. 光绪元年三月甲戌, 总 95 页.
- [13] 蒋君章主编. 新疆经营论 [M]. 正中书店,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 第 86-87 页.
- [14] 左宗棠全集·奏稿 [M]. 卷 46, 上海书店, 1986 年版, 第 40 页.
- [15]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新疆史志 [A]. (清) 七十一著. 新疆纪略 [C]. 2002 年 8 月版, 第 316 页.
- [16] 黄奋生. 蒙藏新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印行, 1938. 1035.
- [17] (日) 井上渐. 包头西北贸易情况 [M]. 东京大学东文研, 1943. 8.
- [18] 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志) 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志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648.

- [19] 郑植昌修. 归绥县志 [M]. 台北华文书局, 1969. 28.
- [20] 左宗棠全集·奏稿 [M]. 卷 48,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2.
- [21]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M]. 再补编, 第二帙, 第 36 页.
- [22] 谢彬. 新疆游记 [M].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第 318 页.
- [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 [M]. 第一一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45 .
- [24] 清德宗实录 [M]. 卷七六, 光绪四年秋七月辛亥.
-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 [M]. 第一一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51 .
- [26] 谢彬. 新疆游记 [M].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第 317 页.
- [27]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M]. 第八册, 中国地图出版社初版, 1996. 57-58、55-56、52-53.
- [28] 张鼎彝著. 绥乘 [M]. 泰东图书局, 1921. 9.
- [29]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M]. 再补编, 第二帙, 第 36 页.
- [30] 姚明辉. 蒙古志 [M]. 中国图书公司, 光绪 33 年丁未 12 月第 1 版, 第 53 页.
- [31] 韩儒林著. 穹庐集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269.
- [3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M]. 第八册,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初版, 1996. 55-56.
- [33]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M]. 第八册,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初版, 1996. 52-53.
- [34] 宋伯鲁. 新疆建置志·卷二 [M]. 民国二十三年陕西通志馆排印本, 第 9 页.
- [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 [M]. 第一一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0.

The North Road Transportation of Army Provisions in 1875-1876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LI Man-x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decided to recover Xinjiang in 1875, the first year of Guangxu Emperor. Zuo Zongtang, as the imperial envoy who was dispatched by Qing Government, opened up the north road to resolve the provision transporting problem of west-advancing army of Qing.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at the issues which encountered in the transporting process of army provision through the north road in 1875-1876, including the west-advancing troop disposing, the setting of the North Road Transportation Bureau, the transporting route of army provision and some other details.

Key words: west-advancing army; Bureau of Provision; North Road Transporting Bureau; transporting route of army provision

收稿日期: 2014-11-23;

作者简介：李满喜（1981-），女，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2013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史方面的学习与研究。